

深圳農村經濟系列叢書

SHEN ZHEN NONG CUN JING JI XI LI CONG SHU

紅土地上的璀璨明珠

——記深圳市模範新村

林 雨等著



红土地上的璀璨明珠

林 雨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温定凯

封面设计：谢 鸿

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之五）

红土地上的璀璨明珠

——记深圳市模范新村

林 雨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排版 上海市杨中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32 字数750,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8-01133-8/F·211

定价 29.50元（五册）

献给深圳经济特区创建十周年

《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序

李 广 镇

深圳农村经济，在十年改革开放中经历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一条金色的道路。我市以及来自北京、上海的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报告文学家撰写的这套《深圳农村经济系列丛书》，反映了深圳农村的深刻变化，宣传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讴歌了深圳农民改革创新、艰苦创业的精神，丛书忠实地记录深圳农村十年光辉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农村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是传统落后的产业结构，向三大产业整体协调发展的新型结构转变。农业、工业的产值比重发生根本变化，外向型乡镇工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原来以粮、油为主的农业单一生产结构，已被以禽畜、蔬菜、水产、水果四大鲜活商品基地为主的优化结构所代替。农村第二、第三产业逐步发展，但农业并不萎缩，农产品稳步增长。二是封闭的自给性农业向创汇型的商品农业转变。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形成以“特区、香港”两个市场为目标的贸工农生产体系，商品率、出口率不断增加。三是单家独户“小而全”的经营，向着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大农业方向转变。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几个层次一齐上”的发展方针，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新的组合，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改革，是深圳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农村流通体制。除了粮食实行合同定购制度外，全面取消了统派购制度，农副产品全面放开价格。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已经形成，农村整个市场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面向市场，运用价值规律，引导资金投向建立专业化经营服务的新型企业。华宝牧工商联合公司、宝安县养鸡公司、光明华侨畜牧场等十个单位和经贸系统有出口权的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各自形成专业化经营服务的新型企业，带动经济发展。

——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推行股份合作制。在农村推行集资股份企业的同时，把村办企业固定资产折股分解到村民作为股权，消除长期以来集体财产权属不明，分配无制度等弊端，从而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基层干部廉政建设。

——改进“外引”工作，兴办外向型乡镇企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

在深圳农村经济建设中，涌现出大批有技术、善管理的经济强人，他们是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时代弄潮儿。通过学习、实践，他们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水平，创造了许多业绩，在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中大显身手，作出较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选择一批在我市农村经济建设中卓有建树、值得纪念而富有特色的单位和个人入书，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单位和个人在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成绩。她将给广大读者带来鼓舞和启示。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参加写作的作家们，为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录

边境线上的模范村	宫 常	(1)
闹市里的村庄迈出的新步伐		
——记改革浪潮中的罗湖村	亚 日	(7)
五百年和再过五百年		
——记白泥坑村的十年巨变	成 天	(12)
命运,在这岭南的小山村		
——西坑村散记	鄒 贝	(20)
难忘的海湾村	达 朴	(30)
笋岗村速写	胡 堞	(38)
边界河畔的一颗明珠		
——沙咀村纪行	林 雨	(45)
都市里的村庄	金敏华	(54)
光荣的变迁史		
——记“两个转变”中的南园村	孟 红	(66)
从“草窝”到“金窝”		
——大冲村十年掠影	达 朴	(75)
龙岗镇新生村素描	尚建国	(82)
改革中的新型乡村		
——记沙井镇堂岗村	嗟 夫	(89)
山乡巨变	粤 人	(97)
飘扬在改革前沿的旗帜		
——新安镇西乡村纪行	林 雨	(106)

绿野初绽红蓓蕾 胡 堞 (120)

“鸭屎围”的变迁

——记南岭村 百 达 (128)

边境线上的模范村

宫 常

(一)

黑森森的铁丝网绵亘数公里，铁丝网边是一畦畦绿油油的充满生机的菜地。远处山坡耸立着一栋栋镶着黄色瓷砖的豪华住宅群。小路上，偶尔可见全副武装的军警在巡逻。这里，便是富甲一方的深圳特区罗芳村。

罗芳村离深圳市区4公里，与香港新界仅一水之隔。全村有38户人家，200多人口，其中劳动力仅94人。耕地面积286亩，其中的60多亩在新界那边。

10多年前，这里的成年人几乎都去过香港帮人种菜打工。那时，本村的土地被上级强令种植水稻，一亩地一年打几百斤粮，全年仅收入百余元。而到香港种菜，一天就收入几十港元。谁还愿意返村种水稻“以粮为纲”呢！

这一来可就苦了机关干部，每年一到农忙时节就得卷起裤腿下乡，帮罗芳村农民插秧割稻子。以至干部们自我解嘲，把罗芳村称作“机关附属农场。”

穷怕了，想干的人越来越少，外流的人越来越多。村里每天敲钟催人，却难得有农民下地，村里村外杂草丛生。“罗芳村里脏，农民家里穷”，几乎路人皆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村里推行承包责任制，再不吃“大锅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他们首先改变了生产方针，从过去的“以粮唯一”转变为多种经营。从1981年起，他们改种蔬菜。由上级部门批准全部蔬菜列为外销商品，畅销香港市场。种菜后每亩地年收入高达1万多港元，1个月的产值就相当于过去1年产值的2倍多。接着他们又与渔民村合作，开发了80亩鱼塘，放养鱼虾，销往香港，每年收入3万多元。他们根据村小人少的现状，积极推行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1981年，全村把当年的收入全部投入扩大再生产。家家户户都购置了手扶拖拉机、喷灌器、抽水机，1984年以后又追加生产投资，添置机械设备，由村民集资，在田头安装了自来水管，架设了一条生产专用电线，解决了菜地灌溉问题，生产搞得热气腾腾。农民们每天模黑起床，把摘下的新鲜蔬菜源源运往香港市场，一次就可以收入1000~3000港元。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市场中取胜，罗芳村人从播种、栽培、施肥、灌溉、收割、包装到保鲜等各项工序都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他们实行的蔬菜“倒季节”种植制，就是按“你无我有，你有我早，你早我好”的要求来安排和选种的，大大增加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辛勤劳作换来丰硕成果，1989年全村每户平均收入为45672元，劳动力平均收入为18949元，人平收入为8096元。居罗湖区之冠。

近几年村里又办了7间工厂，拥有员工约890人，从事陶瓷、手袋、制衣、电子等方面的来料加工。1989年，该村收入工缴费196万港元。

改革给罗芳村带来了生机和富庶。现在，这里家家盖起了二层以上的别墅式楼房，购置了彩电、冰箱、组合音响等高档消费品；有的人家还买了摩托车，安装了冷气设备。

据1984年初的统计，这里的许多农民，每个月全家的生活费用高达2000港元左右。多数家庭已接近或超过香港新界农民的水

平。人们安居乐业，不但再没有人偷渡香港，而且已有几户先后从香港回罗芳村安家立业。

(二)

1985年2月12日上午，一辆乳白色的中型面包车，迎着和煦的阳光，穿过绿油油的菜地，驶进了罗芳村。汽车停在一幢镶了黄色瓷砖的三层楼房前，从车上下来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在人们搀扶下，走进这幢楼房。

这位长者就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楼房主人是罗芳村支书陈天乐。

客厅正面摆了一个组合柜，上面放着电视机、福禄寿陶瓷塑像和一些盆景。另外三面墙放的都是酸枝木椅子。薄老环视了厅内陈设后说：“生活过得不错啊”。中等个头、身材稍瘦的陈天乐对薄老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里才开始富起来，现在全村38户，最高年收入5万多元，最低也有1万多元。”听到这里，薄老说：“那要叫万元户村了”。

陈天乐说：“党允许我们勤劳致富，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体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薄老听了十分高兴。他抓住坐在身旁的陈天乐的手问：“你们是怎样富起来的？”

陈天乐说，“开始也有不少人怀疑搞承包是不是社会主义，村党支部成员首先带头承包，结果包出一个万元户来，生产也上来了。事实证明，党的富民政策，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现在，承包土地已从原来140亩发展到280亩。大家发挥所长，生产越搞越好。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痛快工作过。”

“好啊，陈天乐变为‘成天乐’了。”薄老风趣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呵呵地笑起来，陈天乐笑着说：“全靠党的政策好。”

从陈天乐家里出来，薄老到菜地看了一下。他看到一块块绿油油的菜田很高兴，把陈天乐拉到自己与陪同访问的市委领导中间说：“体现政策的要站在中间一起照相”。这时，记者们连忙“咔嚓咔嚓”按下快门。

临别时，薄老握住陈天乐的手说：“你们靠生产致富，成了万元户村，这应向你们祝贺。更重要的是你们理解了社会主义。希望你们更努力，创造更大的成绩。”

（三）

凡到过罗芳村的人对陈天乐的那种廉洁奉公，不图虚名的实干精神，都留下较深的印象。

前段时间，黄贝办事处党委考虑到罗芳村的地理位置特殊，工作环境复杂，决定让陈天乐当脱产干部。但陈天乐找到办事处党委负责同志陈述理由说：我当了20多年农村干部，深深体会到，农村干部不参加生产劳动，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这样，陈天乐坚持不要集体发给的高薪补贴，宁愿做一个不脱产的干部。几年来，他同其它村民一样参加劳动，全家2个劳动力，向集体承包了8.5亩土地，几乎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下地干活，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来。由于陈天乐辛勤劳动，精耕细作，他种的菜长得总比别人好，出售的蔬菜也比别人多。陈天乐在勤劳致富的道路上带了好头。

罗芳村的劳动力平均每人有3.5亩地，一天劳动往往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村干部研究后，集体投资40多万元，把自来水管、电线架设到田头，使全村实现生产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灌溉自流化，大大地减轻了村民们的劳动强度。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村委又狠抓文化设施建设，村里办起了图书馆，建了球场等。

在罗芳村，曾经发生过几起陈天乐“逐客”的事。

有一天，罗芳村来了两位自称是福建客人的。

原来，这两位客人是从报上了解到罗芳村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政府允许他们把种的菜直接运到香港出售。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就是想通过这条“捷径”，把在外省的蔬菜、菜干以及土特产运到这里出口。陈天乐听了他们的介绍后，耐心向来人解释，按政策规定，只限于罗芳村的农产品才可以直接运到新界出售。对方凑到陈天乐的耳边说，如果能帮他们把事情办妥，所得利润，可以按优厚比例给罗芳村分成。陈天乐这时忍不住了，他伸出又粗又黑的手说：请你们看看我的手，如果我们可以超越党的政策规定搞些不正当收入的话，我们何必风里来、雨里去地苦干，请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党的政策，不要搞邪门歪道！

这几年，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罗芳村购买了一辆丰田面包车。陈天乐在用车这个小问题上，也是公私分明，从不因自己的私事滥用公家的车。

有一天，陈天乐接到来自宝安县农村的电话，说他的一个亲戚患了急病，约陈天乐前去见见面。村里其他干部知道这件事后，准备派车送他走一趟。但陈天乐拒绝说：这是我的私事，怎能动用公家的车辆？他告诫大家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公私分明，否则，我们就会失去群众的信赖。最后，他自己掏钱，租车赶到宝安亲戚家。

陈天乐对自己的要求是这样严格，但对村民们则是关怀备至。他有一条规定：村里不管谁生病需要用车的，司机不经批准就可以直接出车。群众赞扬说：阿乐心里装的只有我们群众啊！

(四)

罗芳村党支部从边境农村的实际出发，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们把建立村规民约和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结合起来,运用多种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提高村民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罗芳村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水之隔,每天都有几十人过境耕作,出售农副产品。为了防止违法行为,村党支部先后制订了《过境耕作管理规定》、《外来人员管理规定》、《罗芳村民公约》等。但是,有了村规民约并非就万事大吉了。1983年以前,由于党支部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一些村民乘过境耕作之机,违章携带香烟、布料等物品过境出售,利用市场的差价从中牟利。甚至还有个别村民参与走私活动。

罗芳村党支部紧紧抓住过境人员多,容易受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腐朽思想侵蚀的情况,运用罗芳村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进行对比教育,突出抓好开放政策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

村民陈松喜家有10口人,只有2个劳动力。自1980年以来,他承包了8.5亩地,种菜到香港出售。夫妻俩天天起早摸黑,精耕细作,每年卖菜纯收入达1万多元。他遵纪守法,不走歪门邪道,靠劳动致富,自己建了一幢二层半楼房,购置了现代化高档家具,家有存款,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而另一村民则认为:人无横财不富,趁过境耕作之机走私手表3000只,结果于1980年被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6年。党支部抓住这两个正反典型,对村民进行政策教育,使大家认识到越是开放,越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越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好几次,香港一些走私分子企图通过村民过境耕作之便,把走私物品运进深圳来,结果都遭到村民们的坚决拒绝。由于党支部对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不仅使罗芳村的村民们遵纪守法,就连到这里做临工的100多名外地人员,也没有发生过一起违法行为。整个边境农村社会秩序井然,生产蒸蒸日上,多年被市评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单位。

闹市里的村庄迈出的新步伐

——记改革浪潮中的罗湖村

亚 日

剧变之后的迷惘

罗湖村位于深圳火车站东侧，地处闹市。全村现有 114 户，360 人。办经济特区以前，这里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境农村，1200 多亩耕地和鱼塘分布在罗湖桥畔和九龙新界。

1980 年，政府一声令下，罗湖村原有在中方的土地全部被征用，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耕地一夜之间变成了货币——国家分给土地征用费 400 万元。昔日的农民成了市民。

很快，波光潋滟的鱼塘上耸起高楼大厦，蝶舞蜂飞的菜地建成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罗湖村被现代化的都市建设挤进一隅。村庄里外，脏乱与整洁，静谧与嚣闹，现代化都市的车水马龙与边陲小村鸡啼鸭叫的田园遗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在村民中间产生了恐惧、喜悦、迷惘、等待相交错的心态。

在许多人还未能对这种变化产生清醒的认识之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便彻底解体了。新形势下的经济活动怎么开展？村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党支部要他们拿出办法来。

机会终于来了。

1984年，村委会决定投资170万元与港商合建一座商业大厦，原先上报的名字是“湖京大厦”，打字员把它颠倒了，老支书一看，说，“算了吧，也没有啥大碍”。“湖京”便成了“京湖”。签合同同时，老支书心里直发毛——他心中无数啊！这“京湖大厦”能办好吗？万一亏本怎么办？村里拿出了170万元征地费，还从银行贷款100万元，要是亏了，村民不会答应，自己怎么交帐？他把党员都找来了，要大家都在贷款合同上签字。开业以后，真的亏了！年。机会来了，却不会把握。村民们失望了，党支部没凝聚力，全村象一盘散沙。1985年改选支委，10个党员有6个缺席，紧接着又有4个党员要求退党。

村党支部基本上瘫痪了。

接踵而来的是短暂的无政府状态。村民纷纷占地建私房。动手早的围墙圈地，动手晚的填塘占地，全村的大小鱼塘被填平。许多村民沿着人民南路乱搭违章建筑，年轻人无所事事……

整顿带来奋进

罗湖村终于从迷惘与混乱中清醒过来，走上了与特区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这，得力于村党支部的整顿，特别是得力于新选出的支部书记袁汉龄。

1986年整党后，40岁的袁汉龄当上了罗湖村党支部书记。他毕业于广州二十八中学，1963年回乡插队，当过村里的会计、车辆管理员，也当过支部副书记。支部改选后，虽然3名支委只换了1名，但是情况很快起了变化。

新班子并没有故作惊人之举，他们选择了一条适合罗湖村情况的发展道路。

前几年深圳市大兴土木，需要大量平整土地。村里从土地征收费中取出一笔钱，购买了77辆“泥头车”（自卸卡车）。车队一年纯

收入 60 万元。1986 年以后，“泥头车”已开始残旧。有人建议把泥头车转包出去，袁汉龄却主张全部卖掉。因为这时特区建设已从铺摊子、打基础，转到上水平、求效益的新阶段，特区内用于砂石运输的自卸卡车已从饱和走向过剩，承包利润将低于卖车款转作基建投资带来的效益。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对的。他们将卖车所得的 100 多万元用于兴办实业，第二年便有盈利。

1987 年 4 月，罗湖村投资了 400 万元兴建“罗湖工业大厦”，至 1988 年 6 月建成启用。这座工业大厦高 6 层，使用面积达 14700 平方米，有 3 部载货电梯，36 个卫生间，还有配电房、消防设施、停车场，每层的阳台上都建有防治空气污染的绿化槽。外商参观后觉得，就设计和建筑的新颖、实用、美观来说，九龙观塘和长沙湾的许多工业大厦也比不上它。大厦后面还建成一座 7 层高，附设食堂的职工宿舍，共投资 150 万元。

89 年初，罗湖村又投资 600 万元在大厦东侧再建一栋同样规模的工业大厦和宿舍楼。还建了篮球场、医疗室、图书室等福利设施。宿舍全楼每个房间都附设有阳台、洗手间、冲凉房以及热水管道。

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区已经形成，这里地处沿河路南侧，离文锦渡仅 600 米，向南走 700 米便是罗湖海关。因为地理环境优越，大厦刚落成，就有港商前来签约。

1989 年，罗湖村总收入为 559 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为 215 万元。

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至 1989 年，罗湖村已拥有来料加工企业 10 间，与港商合资经营酒楼 2 间，共有楼宇、厂房面积 3.7 万平方米，集体固定资产达 1836 万元。